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2020年6月15日至7月3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受教育权：冠状病毒病危机对受教育权的影响——关切、挑战
与机遇

受教育权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8/4 号、第 35/2 号和第 38/9 号决议编写，受教育权利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赞扬了各国政府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危机期间在应对科学不确定性的同时保护人类生命的努力。

COVID-19 危机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诸多影响，并导致了经济危机和教育危机。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从人权角度分析了她认为最紧迫的问题。实际上，要确保为应对这场大流行病而采取的措施不损害受教育权，不增加最边缘化人群的痛苦，在人权框架内采取行动至关重要。

特别报告员强调，虽然许多政府和非政府利益攸关方在全球各个角落采取了许多创新措施，以确保教育的连续性，但绝不能指望这些措施能够弥补全球对如此大规模的危机明显缺乏准备的状况。我们过去未能建立强大和有复原力的教育系统，也未能消除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对最弱势和边缘化群体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情况是任何仓促采取的临时措施都无法完全应对的。

* 本文件迟交给会议事务部门，但未按大会第 53/208 B 号决议第 8 段的规定说明理由。



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一些建议。她特别建议进行一次彻底的评估，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揭示导致危机期间享有受教育权方面歧视加剧的动态关系。评估应包括：对为应对大流行所采取措施导致不平等加剧进行分析；调查教育系统背后的经济和金融模式的可持续性，包括公共教育机构资金不足的后果；审查私人行为体在教育中的作用；评估为教育工作者，包括私营部门的教育工作者提供的社会保护是否充分；以及审查国家行政部门、教育机构、教师、学生、家长和社区之间缺乏合作的情况。

此外，特别报告员强调，组织在线远程学习(连同使用广播和电视)应被视为旨在解决危机的临时办法。教育数字化绝不应取代教师的校内教学，从长远来看，私人行为体凭借数字技术大规模进入教育领域应被视为对教育系统和所有人的受教育权的一个重大威胁。关于今后这种学习模式的正确位置，需要进行彻底的辩论，不仅要考虑到可能提供的机会，还要考虑到屏幕对儿童和青年的有害影响，包括对儿童和青年的健康权和受教育权的影响。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4
二. 法律和监管框架	5
三. 关切的问题	7
A. 结构性歧视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8
B. 补救工具的适当和不足之处：高科技、低技术和无技术解决方案	10
C. 教育数字化：挑战与机遇	12
D. 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权利	13
E. 公共教育系统的未来	17
四. 结论和建议	18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8/4 号、第 35/2 号和第 38/9 号决议编写，受教育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论述了冠状病毒病(COVID-19)危机对受教育权的影响。鉴于这场大流行病已经并将继续严重影响世界各地的受教育权，特别报告员决定修改其关于专题报告的计划，为正在进行的关于如何确保教育连续性的全球讨论做出贡献。在本报告中，她从人权角度阐述了她认为最紧迫的问题。¹

2. 关于 COVID-19 危机对教育系统和学生的严峻影响，已经有很多著述。国家、区域和国际级别的许多行为体，无论是政府、政府间还是非政府行为体，都发布了有益的指导方针和建议，说明如何解决世界各地因学校和大学关闭而受到影响的 15 亿多学生的状况。总体而言，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称，截至 2020 年 4 月 2 日，194 个国家和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关闭了学校，另一些国家在部分地区关闭了学校。²

3. 特别报告员欢迎教科文组织、伊斯兰世界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非洲联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和机构间危境教育网络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和工会所做的工作。她赞扬它们努力促进国际合作，分享良好做法，并就如何最好地解决所谓的教育危机提供有用的指导方针和建议。

4. 在危机的第一个阶段，教育机构仓促关闭，通常没有任何预警或准备，如今这个阶段已经过去，必须对所发生的情况进行盘点，并分析这场危机对教育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

5. 随着一些国家慢慢开始或计划重新开放教育机构，COVID-19 危机对教育的全面影响将取决于现在采取的措施。危机期间采取的大多数措施都必须被视为临时措施，但另一些措施可能开拓了新的可能性。主要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催生积极的变化，同时又不破坏近几十年来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在受教育机会方面。

6. 应该对危机的影响进行评估，但同时不能忽视整体和更广泛的背景：公共教育系统仍然资金不足，面临压力，教育不平等现象仍然令人震惊，获得教育是许多人的梦想，在这场大流行病爆发前，已经有 2.58 亿儿童和青年失学³，其中包括残疾儿童。⁴ 今天，约有 7.73 亿人仍然是文盲；其中许多是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妇女。⁵

¹ 原计划提交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关于受教育权的文化层面的专题报告，将在以后编写以供审议。

² 见 <https://en.unesco.org/covid19/educationresponse>。

³ 见 <https://tellmaps.com/uis/oosc/#!/tellmap/-528275754>。

⁴ 国际残疾人联盟和国际残疾与发展联合会提交的材料。

⁵ 见 <http://uis.unesco.org/en/topic/literacy>。

7. 这场危机导致关于落实受教育权的一些广为人知的问题急剧恶化。评估危机的影响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当前教育系统的某些特征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扩大了 COVID-19 形势的负面(或正面)影响。特别是，在教育危机期间结构性歧视引人注目，最边缘化和最弱势群体受到的打击最大。此外，这场教育危机很可能对公共教育系统脆弱、公民和公共机构之间缺乏相互信任、缺乏与教师工会和协会的社会对话、没有培养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密切关系传统的国家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8. 在编写报告的过程中，特别报告员参加了由她的任务主持，与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权倡议和受教育权倡议合作组织的一场在线讨论，主题是这场大流行病导致的教育不平等的加剧。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作出了贡献，包括教科文组织、伊斯兰世界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银行、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和机构间危境教育网络。此外，特别报告员应邀参加了两次在线讨论：一次由法语国家教育和培训工会委员会与国际教育协会合作举办，讨论危机期间教师的处境和参与情况；另一次由世界教育运动举办，讨论民间社会面临的困难以及危机对受教育权的影响。她衷心感谢所有参与者投入的时间和提出的意见，包括那些自发提交报告和材料的组织。⁶

二. 法律和监管框架

9. 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不包含关于可能克减国家义务的条款。

10. 因此，在危机期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必须继续确保受教育权(第十三条)，这也是《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一项义务(第二十六条)。如果采取的措施限制了《公约》权利，如关闭或部分重新开放教育机构，这些措施应符合《公约》第四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条件。

11. 正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所强调的那样，从本质上讲，限制《公约》权利的措施必须是抗击 COVID-19 所致公共卫生危机之必需，并且合理和相称。缔约国不应滥用为抗疫实施的紧急措施和权力，一旦这些措施和权力对于保护公共健康不再必需，就应立即取消。此外，应对这场大流行病的措施应基于保护公众健康的最佳科学证据。⁷

12. 特别报告员同意委员会的意见，由于这次大流行病及所采取的抗疫措施已经对最边缘化的群体产生了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各国必须尽一切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以最公平的方式抗击 COVID-19，以避免给这些边缘化群体带来进一步的经济负担。资源分配应优先考虑这些群体的特殊需要。⁸

⁶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材料可在以下网址查阅：
www.ohchr.org/EN/Issues/Education/SREducation/Pages/SREducationIndex.aspx。

⁷ E/C.12/2020/1，第 10-11 段。

⁸ 同上，第 14 段。

13. 受教育权对儿童尤其重要。与《公约》一样，《儿童权利公约》不包含克减条款。但儿童权利委员会明确表示，为保护公众健康而对儿童权利施加的限制必须仅在必要时实施，必须适度，并保持在绝对最低限度。⁹ 此外，任何此类限制都应反映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的原则(《公约》第 3 条第 1 款)。对儿童受教育权的限制也包括在内(第 28 条)。¹⁰

14. 利用关于受教育权的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1999 年)中提出的框架来评估挑战和优先事项，并确保最弱势群体不会掉队，这一点至关重要。根据这一框架¹¹，教育必须具有以下相互关联的基本特征，所有这些特征在危机时期都特别重要：

(a) 可提供性，这要求提供能够运作的教育机构，包括男女卫生设施、安全饮用水，以及训练有素的教师、教材、计算机设备以及信息技术；

(b) 可获取性，意思是人人都应该能够利用教育机构和方案，不受任何歧视。

(c) 可接受性，意思是教育的形式和实质内容，包括课程和教学方法，必须得到学生的接受(例如適切、文化上合适和优质)，在适当情况下，也应该得到学生家长的接受；这一点不得违反《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教育目标和缔约国依照《公约》第十三条第三款和第四款可能批准的最低教育标准；

(d) 可调适性，要求教育必须灵活，能够针对变动中的社会和社区的需求而进行调适，并符合各种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学生的需求。

15. 特别报告员理解许多人因为教育机构的关闭而感到措手不及，也理解紧急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但她坚持认为必须遵守这一框架，不仅是为了平等和公平，也是为了效率。例如，在实施远程教育时必须牢记框架，以避免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平等。此外，可提供性、可获取性、可接受性和可调适性框架要求机构、教师、家庭和社区密切合作，以确保学生及其家庭的需求得到理解。这与在危机时期得到强化的某些专制和自上而下的态度相左，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体现。

16. 现在仍有机会在大流行病过后“重建得更好”，并解决过去的不足。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未能充分纳入立足人权方针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框架为何会加剧这场大流行病对最弱势群体受教育权的负面影响。

17. 似乎有必要加强和调整这些政策以及法律和监管框架以便应对下一场危机，例如：

(a) 将可提供性、可获取性、可接受性、可调适性框架纳入各级教育系统，包括学校一级。该框架是解决在享有包容性优质教育权利方面不平等的有力工具。它有助于在教育系统内建立人权文化，并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父母和社区)之间建立合作文化，以此作为及时应对未来危机的坚实基础；

⁹ 儿童权利委员会，2020 年 4 月 7 日的声明，可查阅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INT/CRC/ST.A/9095&Lang=en。

¹⁰ 同上。

¹¹ 另见《关于国家提供公共教育和规范私人参办教育的人权义务的阿比让原则》原则 14。

(b) 充分纳入儿童权利，对儿童而言，受教育权特别重要，儿童应被视为权利持有人；

(c) 优先关注最弱势群体；

(d) 在国家教育系统内制定全局应急教育准备计划，因为很少有国家拥有考虑到危机状况的教育计划¹²，各级教育规划人员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充分培训。这些计划应基于人人享有的受教育权以及可提供性、可获取性、可接受性、可调适性框架；

(e) 教育政策应以公共教育权为核心。具体而言，应根据《公约》第十三条，作为一项核心义务，在法律和监管框架纳入在不歧视基础上进入公共教育机构和获得教育课程的权利。¹³ 拥有强大公共教育系统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有可能应对教育危机，正如拥有强大公共卫生服务的国家更有能力应对卫生危机一样。更广泛而言，持久落实人人享有公共、全纳、高质量教育的权利是消除不平等的最佳途径，这些不平等不是 COVID-19 危机造成的，但危机将它们暴露了出来并显著扩大。危机期间采取的临时措施只能尽量减少影响，但无法消除不平等。

18. 由于社会受到具有长期影响的巨大经济危机的打击，特别报告员提醒各国，根据《公约》第二条，它们有义务投入尽可能多的资源逐步全面实现《公约》所载权利。委员会认为，在这方面，任何倒退措施都需要经过最为慎重的考虑，必须有充分的理由，顾及到《公约》规定权利的完整性，并以充分利用了所有可能的资源为条件。¹⁴ 在这方面，《关于国家提供公共教育和规范私人参办教育的人权义务的阿比让原则》提供了有益的指南。¹⁵

三. 关切的问题

19. 大多数国家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政府间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已经尽其所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应对这场教育危机。特别报告员对这些努力致敬。她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证词，涉及通过高科技解决方案(如在线教学)、低技术解决方案(使用广播或电视)或无技术解决方案(如分发文件)部署远程学习；为帮助最弱势群体而采取的行动；以及向教师和家庭提供的支持，以确保提供家庭教育并关注学生及其家庭的福祉。她特别向教师致敬，其中许多是妇女，他们在设计新教学方法和寻找与学生保持联系的方法方面展现出勇气(特别是那些照顾一线工作人员子女的人)、承诺、创造性，并在适应新环境方面表现出灵活性。

20. 然而，这种措施永远无法弥补全球对如此大规模的危机明显缺乏准备的事实。此外，过去未能建立强大和有应对能力的教育系统对最弱势和边缘化群体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情况是任何仓促采取的临时措施都无法完全应对的。

¹² <https://inee.org/collections/education-planning>。

¹³ 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第 57 段。

¹⁴ 关于缔约国义务的性质第 3 号一般性意见(1990 年)，第 9 段。

¹⁵ 尤其见原则 45-46。

21. 全面评估是必要的，因为利益相关者必须确保他们为下一次危机做好准备。评估应包括：分析为应对大流行所采取措施导致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调查教育系统背后经济和金融模式的可持续性，包括公共教育机构资金不足的后果；审查私人行为体在教育中的作用；评估为教育工作者，包括私营部门的教育工作者提供的社会保护是否充分；以及审查国家行政部门、教育机构、教师、学生、家长和社区之间缺乏合作的情况。此外，随着数字学习呈现指数级增长，关于今后这种学习模式的正确位置，需要进行彻底的辩论，不仅要考虑到可能提供的机会，还要考虑到屏幕对儿童和青年的有害影响，包括对儿童和青年的健康权和受教育权的影响。还需要关注转向在线教育给那些有可能遭遇数字排斥或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带来的风险。

A. 结构性歧视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22. 特别报告员深感关切的是，由于教育机构的关闭以及这场大流行病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显著扩大。

23. 在后 COVID-19 环境中，新的歧视理由可能日益显著，例如无法上网。然而，归根结底，这些理由不过是社会中已经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特别是基于社会和经济地位、偏远地区、性别、语言、宗教、肤色、民族或族裔血统、残疾或其他地位的不平等。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在获得教育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人道主义背景下的儿童状况(难民¹⁶ 和受冲突影响人口)也令人十分关切。

24. 学校和大学的关闭中断了无数人的学习。有些地方，关闭只持续了几周，有时父母能够确保有效的家庭教育，还有些地方，儿童得到了教师的持续支持，并能够使用数字学习平台，这时，学校关闭的后果可能有限。过去就学业良好的学生，以及在家里能享有良好的社会经济和身心条件的儿童可能根本没有问题。那些能够获得在线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学和社会支持的较年长的学生也是如此。

25. 然而，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学校关闭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对他们的受教育权会产生重大长期影响，他们也失去了可能影响其未来的机会。¹⁷ 对许多儿童而言，学校关闭导致不平等加剧。对于社会弱势儿童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父母无法确保有效的家庭教育，不会说学校使用的同一种语言，他们生活在劣质或不安全的住房中，遭到数字排斥，需要照顾他人，他们因学校关闭而遭遇经济不稳定和饥饿，他们无法获得或受益于在线学习。COVID-19 大流行可能导致儿童和青年因各种原因永久辍学，包括父母在后 COVID-19 环境下无力支付学费，儿童和青年需要在经济上支持家庭，学校破产，或学校无力保障卫生和保护措施，以确保短期内学生能安全返校。对许多人来说，学校关闭也意味着无法获得社会服务，包括学校供餐和心理支持服务。封锁和切断与教育服务的联系增加了家庭暴力和社会心理问题、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童婚、童工和贩运儿童、在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的风险。根据以往的危机情况，如埃博拉危机，早期估计预测，一旦所有学校重新开放，失学女童将比大流行前多 1000 万。¹⁸

¹⁶ 见特别报告员关于难民的受教育权的报告(A/73/262)。

¹⁷ George Psacharopoulos and others, “The COVID-19 cost of school closures” (Brookings, 29 April 2020).

¹⁸ 马拉拉基金，“女童的教育与冠状病毒病：过去的冲击可以教会我们如何减轻大流行病的影响”，第 2 页，以及人权高专办，“冠状病毒病与妇女人权：指南”，2020 年 4 月 15 日。

26. 对于那些因为失业而不再能够养活自己和/或偿还债务的学生来说，情况也仍然极其困难。一些外国学生无法回家，并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一贫如洗，生活在质量低劣的住房中。

27. 很多时候，为尽量减少 COVID-19 对教育连续性的影响而采取的措施没有重视实现人权，要求决策者处理最弱势群体的状况和需求，并确保落实不歧视原则。

28. 例如，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有资料表明，一些政府在危机期间降低了难民社区教育的优先地位。也发生了歧视卫生工作者子女的案例，因为担心他们有传染性，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学校重新开放后不被允许回到他们通常的班级。在某些情况下，被拘留和受国家照料的儿童的教育由于 COVID-19 而暂停。

29. 据报告，一些政府没有解决残疾儿童的状况，或者采取的措施为时已晚。智力残疾儿童被排斥的风险更高，更有可能辍学，因为很少有父母或照顾者接受过对他们进行家庭教育的培训。此外，远程学习往往不适合也不能适应他们的教育需求。智力残疾儿童可能需要额外的面对面支持。¹⁹ 尽管如此，在这方面已经指出了一些良好做法。例如，据报告，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印度、肯尼亚、美利坚合众国和越南等国，已经分发了针对家庭和护理人员的指南和建议。²⁰ 在秘鲁，据报告，通过 50 个地方广播电台以九种土著语言和通过公共电视以手语提供家庭学校教育，覆盖了安第斯山脉和亚马孙地区偏远社区的 20 多万名学生。²¹

30. 学校重新开放后，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可能会延续。例如，有报告表明，在一些儿童可自愿返校的国家，实际返校的最弱势儿童人数很少，这令特别报告员感到担心。²²

31. 鉴于教育作为一项赋能权利的重要性，教育领域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因为教育为所有人提供了探索和实现其潜力的可能性。因此，教育中的不平等会延续并加剧未来的不平等。这场危机进一步表明，人权是如何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特别是受教育权、享有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包括在教育机构中)、获得充足营养食物的权利(当食物由学校提供时)、获得适当住房的权利(在家上学所必需的)、获得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和工作权(往往取决于人们获得的教育水平)，以及儿童免受一切形式暴力、伤害或虐待的权利。教育是连接许多有利于弱势群体，特别是儿童的公共行动政策的交叉点。当教育中断时，许多其他服务也会中断。

¹⁹ 国际残疾人联盟和国际残疾与发展联合会提交的材料。

²⁰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冠状病毒病和残疾人的权利：指南”(2020 年 4 月 29 日)，以及国际残疾人联盟和国际残疾与发展联合会提交的材料。

²¹ 国际残疾人联盟和国际残疾与发展联合会提交的材料。另见 <https://noticia.educacionenred.pe/2020/05/aprendo-casa-estrategia-minedu-difundio-mas-700-programas-lenguas-originarias-199810.html> (西班牙文)。

²² 全国中等教育工会(法国)提交的材料。

B. 补救工具的适当和不足之处：高科技、低技术和无技术解决方案

32. 许多国家为通过互联网、电视和广播制定教育方案作出了巨大努力，相关信息已经得到传播。一些国家分发了电脑、平板电脑、电视屏幕和收音机，部署了互联网连接，通过邮寄或在校园里分发了学习材料。²³

33. 特别报告员欢迎这些努力，但同时警告不要把高科技解决方案视为危机时期确保教育连续性的主要或最佳方式，因为绝对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考虑高科技、低技术和无技术相结合的解决方案。最简单的技术，如印刷材料，可以在学校停课期间对学习的连续性产生积极影响，应成为应对措施的核心内容。

34. 例如，机构间危境教育网络建议，视具体情况和群体不同，多管齐下的方法可能最适合，同时考虑到，从供求两个角度来看，在网络连通性有限的地区，大多数数字远程学习都很难实现。首先，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环境中，大多数教育系统在建立之时并不支持互联网连接。其次，大多数被边缘化的人群没有财力或物力来让他们的孩子获得数字远程教育。例如，有必要考虑以下因素：下载、上传和流媒体额外数据的成本；家庭拥有(足够的)硬件来支持在线学习的可能性有限；在使用家庭所有的硬件方面可能存在性别分化；在危机期间，家庭收入可能减少，使用储蓄支付关键开支的情况会增加。²⁴

35. 此外，保持一定程度的师生互动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至关重要。²⁵ 还有，即使在最贫穷的家庭和文化水平有限的家庭，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参与和支持也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法大大提高学习成果。²⁶

36. 过度依赖在线远程学习工具来确保教育的连续性有加剧不平等的危险。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字不言自明：因 COVID-19 大流行而远离课堂的学生中有一半(约 8.26 亿学生)无法使用家用电脑，43%的学生(7.06 亿)在家不能上网。²⁷

37. 低收入国家的差距尤其明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89%的学生无法使用家用电脑，82%的学生无法上网。此外，虽然手机可以让学生获取信息、与老师联系以及相互联系，但约有 5600 万学生生活在没有手机网络服务的地方——其中近一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²⁸ 关于使用在线工具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偏远或农村地区(包括发达国家)的人群面临的困难已经发表了许多报告。

²³ 见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ndHgP53atJ5J-EtxgWcpSfYG8LdzHpUsnb6mWybErYg/edit?ts=5e6f893e#gid=0>。另见 Shelby Carvalho and Lee Crawford, "School's out: now what?"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25 March 2020).

²⁴ INEE, "Technical note: educ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New York, April 2020), p. 13.

²⁵ 同上。

²⁶ 救助儿童会提交的材料。

²⁷ 见 <https://en.unesco.org/news/startling-digital-divides-distance-learning-emerge>。这个网页上的数字是由教科文组织协调的国际联合会“教师工作队”根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汇编而成的。

²⁸ 同上。

38.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关于在线远程学习的统计数据可能不够准确。例如，据报告，在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一些国家，收集这类统计数据时没有考虑到私立学校。²⁹ 非正规教育环境也可能没有被考虑在内。此外，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学学生，也关系到教师。³⁰

39. 特别报告员强调，问题不仅在于是否拥有电脑或手机。对父母、老师和学生而言，重要的是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回顾说，上文第14(b)段中规定的可获取性标准包括信息和认知两个部分。此外，需要对远程在线教育取得的成果进行认真评估，因为连通性标准远不能证明教育成功。

40. 因此，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远程教育教师较低的准备程度和培训水平也是令人关切的问题。代表全球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工会的教育国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约 29%的受访者表示，在从到校学习向数字化和远程学习过渡期间，政府为教师提供了适当和充分的支持。³¹

41.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广播和电视之类的低技术传播方式能够而且确实比互联网惠及更多儿童，但广播的使用远没有到达普及的程度。在使用这种方式的地方，它们无法惠及最边缘化和处境最不利的学生，包括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生。³² 此外，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例如在乍得和其他低收入国家，最边缘化人群仍然用不上电。

42. 女童使用技术的机会得到了特别的关注。有报告指出，“有害的性别规范和对女童安全或名誉风险的看法使一些父母不愿意让女孩接触设备。在最贫穷的国家，女性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比男性低 33%。”³³

43. 残疾儿童的状况也需要更多关注。许多失聪或听力障碍的学生无法接受教育，而且并非所有用于远程学习的网络平台对失明的学生都是无障碍的。³⁴

44. 解决用电、上网和使用计算机等高科技设备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意愿问题。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回顾了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就《公约》第十五条所载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利益的权利所开展的工作，以及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一项一般性意见。³⁵

²⁹ Comité européen pour l'enseignement catholique, Information Bulletin No. 7 (May 2020), p. 4. 可查阅 http://enseignement.catholique.be/ceec_wp/wp-content/uploads/2017/04/CEEC-Newsletter-N%C2%B07-Mai2020fr%C3%A7s.pdf (法文)。

³⁰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VID-19 and education: how education unions are responding – survey report” (April 2020), pp. 9–10.

³¹ 同上，第 6-7 页。

³² 救助儿童会提交的材料。另见 Carvalho and Crawford, “School’s out: now what?”.

³³ 马拉拉基金，“女童的教育与冠状病毒病”，第 8 页。

³⁴ 国际残疾人联盟和国际残疾与发展联合会提交的材料。

³⁵ A/HRC/20/26 和关于科学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0 年)。

C. 教育数字化：挑战与机遇

45. 尽管在获得在线远程教育方面存在不足，但由于这场卫生危机，这种学习模式的使用迅速增加，许多人可能认为这种模式很有希望在未来更好地落实所有人的受教育权。

46. 特别报告员强调，确实可能会出现许多机遇，但她警告说，不要提倡对受教育权不利而无益的简单解决办法。有一些挑战需要得到应对和辩论，应在包括学生、家长和教师在内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以立足教育权的方式做出决定。必须认真考虑数字教育的位置和内容、其意义和效率及其对儿童和其他学生健康和教育的影响。例如，必须考虑到儿童大量使用屏幕的后果和在线虐待的威胁。

47. 组织在线远程学习(连同使用广播和电视)只能被视为旨在解决危机的临时解决办法。教育的数字化绝不应该取代教师的校内教学。如果远程教育在这场大流行病结束后成为新的教育范式，它将影响受教育权的核心和宗旨。校内和面对面的教育使教师不仅能够提供内容，还能确保内容被理解和接受。此外，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它旨在培养社会情感技能、批判精神、创造力、公民意识，并在需要互动和融合的群体之间培养相互理解，以便共同生活和建设一个和平的社会。教育还旨在将儿童与自然及其环境联系起来。教育是由一群需要人与人之间真实互动的学习者开展的一种社会行为。

48. 远程学习工具必须使用适应各地具体情况，特别是当地语言的高质量内容，还必须辅以对教师和学生有效持续培训。这些工具应允许教师和学生提供意见，允许根据学生的水平和能力进行有区别的教学，还应允许学术自由和创造性。

49. 数字教育提出了其他重要问题，包括数据保护以及教师和学生隐私方面的问题。人权观察的一名研究员和儿童权利倡导者指出：

儿童的教育数据受到的保护远不及健康数据受到的保护。许多国家都有法规管理可识别个人身份的健康数据的适当使用和披露，即使在紧急局势下也是如此。而尽管儿童在学校的数据可能同样敏感——可反映姓名、家庭住址、行为和其他高度个人化的细节，在被滥用时会伤害儿童和家庭——但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保护儿童的数据隐私法。³⁶

在这方面，对于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广受欢迎的远程学习选项已经表示了关切。³⁷对教师和学生的远程监控以及出售数据的行为尤其令人担忧。

50.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回顾，根据《阿比让原则》，各国必须界定和执行以下方面的最低标准：

隐私和数据保护，特别确保在个人数据方面尊重法治和道德规范。各国还必须确保未经同意不得收集或保留包括生物特征数据在内的任何个人数据，未经明确同意不得与第三方分享个人数据，也不得将个人数据用于教育以外的目的，包括商业、移民或安全目的。³⁸

³⁶ Hye Jung Han, “As schools close over coronavirus, protect kids’ privacy in online learning” (Human Rights Watch, 27 March 2020).

³⁷ 同上。教科文组织列出的可选方案见 <https://en.unesco.org/covid19/educationresponse/solutions>。

³⁸ 原则 55。

51. 从长远来看，私人行为体凭借数字技术大规模进入教育领域是对教育系统和受教育权的重大威胁，必须根据现有标准，包括《阿比让原则》予以控制。特别报告员特别关切的是，私人行为体在这方面的突出作用可能会导致试图从 COVID-19 危机中获利的商业实体获取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尽管研究显示，基于收入、地点和性别，在获取数字学习技术方面存在巨大差距。³⁹

52. 国家、政府间组织和私人行为体之间伙伴关系的发展提出了一些问题，涉及每个行为体参与教育的性质以及它们将从这种伙伴关系中获得的利益，无论是在公共补贴、数据收集、针对儿童和青年的广告方面⁴⁰，还是在危机结束后影响教育系统的长期发展方面。⁴¹ 将数据和教育控制权移交给位于少数几个国家的一小撮公司所带来的风险不可低估。商业解决方案有一系列替代方案，包括知识共享许可下的工具和公共在线学习平台，应予以探索和加强。

D. 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权利

53. 与 COVID-19 相关的教育决策必须考虑到学习者以社区为基础的事实。这需要认识到教育决策的不同方面对教授学生、照料学生和与学生共享服务的人员权利的影响。⁴²

54. COVID-19 危机不仅影响了学生，也影响了教师。据教科文组织称，COVID-19 大流行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扰乱影响了 6 300 万中小学教师。⁴³ 这还不包括其他教育工作者，如幼师和高等教育教师，以及在教育机构工作的所有其他工作人员，如临时或学期讲师、为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和残疾学生提供额外支持的人员、行政人员、清洁工、保安人员、餐厅员工和汽车司机。

55. 这些工作者也是权利持有者。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营部门工作，他们都应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所有权利，特别是享有公正和良好工作条件的权利，其中包括公平的报酬、安全卫生的工作条件、平等的晋升机会、休息、闲暇与工作时间的合理限制；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权；组建工会和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的权利；以及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二条)。

56. 这场卫生危机揭示了世界各地许多学校条件恶劣，教师和学生在于过于拥挤的教室上课，有时没有或很难获得水和卫生设施。许多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缺乏社会保护和培训。

³⁹ 乐施会提交的材料。

⁴⁰ 例如，见 Solidarité Laïque, “Beware: major risk of privatization of world education!”. 另见 A/69/286。

⁴¹ 例如，见 Ben Williamson, “New pandemic edtech power networks” (1 April 2020).

⁴² Aoife Nolan, “Should schools reopen? The human rights risk - an advisory note to Independent SAGE” (May 2020).

⁴³ 见 <https://en.unesco.org/news/startling-digital-divides-distance-learning-emerge>.

1. 让教师、教师工会以及教师协会参与决策

57. 具体落实所有人的受教育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足够数量的受过培训的教师投身其中，能够参与关于如何最有力地保障受教育权的决策过程。

58. 特别报告员强调，工会权利和参与决策进程的权利不是一种奢侈品，只能在太平无事时行使。在危机时期为了效率这些权利也至关重要。老师了解他们的学生。老师往往最适合在当地环境中发挥创新和创造能力，与家庭和社区联系，评估他们的困难和需求，并调整自己的行动以满足这些需求。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也需要得到支持、信任和倾听，并习惯于发展和运用他们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在规划应对未来危机的方案时，必须认识到教师自己也有家庭和其他责任。

59. 然而，危机时期往往会强化专制和自上而下的态度，包括在教育领域。虽然也有一些政府与工会在危机期间合作相当好的例子，例如在毛里求斯，⁴⁴ 但特别报告员仍然感到关切的是，在许多情况下，没有与教师协会和工会充分协商，也没有让它们参与决策。像关闭和重新开放教育机构这样重要的决定就是如此。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称，有时工会通过媒体才获悉下列信息：学校关闭(例如在法国)⁴⁵，远程教育平台和内容、工具和方法的选择和使用，部分完成的学业是否获得认可，学校日程的重新安排以及工作条件的变化。

60. 在一些国家，例如尼日尔，据报道政府主管部门仍然尚未就 COVID-19 危机与教师工会合作。在其他国家，社会对话的水平和质量都不高，阻碍了应对这场卫生危机的合作和共同努力。在一些国家，在危机发生前，政府主管部门和工会之间就已经沟通糟糕，关系紧张，现在问题就尤其严重，例如加蓬和海地。

61. 在世界许多地方，教师工会组织起来支持政府的行动或补偿政府的不作为。⁴⁶ 例如，工会组织了关于新远程教学方法的培训，传播关于卫生措施和规程的信息，并交流经验信息。许多工会游说政府确保尊重其成员的权利，⁴⁷ 包括在卫生条件下工作的权利，并尽量减少这场危机对学生的影响。

62. 特别报告员认识到，由于围绕这场大流行病存在许多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各国政府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做出艰难的决定。关闭学校的决定做出得太快，以至于在世界许多地方，教育系统没有时间制定计划和调整工作方法，以确保教育的连续性。然而，如前所述，应对危机的能力建设必须在危机发生前进行。在教育系统中，这包括在国家 and 地方各级政府、教师(包括教师协会和工会)、家长和社区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和相互信任。

2. 享有安全卫生工作条件的权利

63. 特别报告员还对危机期间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卫生条件感到关切，特别是那些继续照顾一线工作者如卫生工作者子女的人。随着各国开始或计划重新开放，这一问题尤其严重，特别是在卫生系统脆弱的国家。不过，这种担忧是全球性的。

⁴⁴ 毛里求斯政府教师工会提交的材料。

⁴⁵ 全国中等教育工会(法国)提交的材料。

⁴⁶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VID-19 and education”, pp. 18–19.

⁴⁷ 同上，第 20 页。

64. 特别报告员认同联合国其他特别程序所表达的关切，即在一些国家和经济部门，一些一线工人在传染高峰期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并同意所有国家和工商企业应确保采取预防和防范措施保护每一名工人的建议。⁴⁸ 这也影响到教育工作者，包括私立教育机构的教育工作者。应特别注意可能因年龄、健康状况或族裔等原因而在 COVID-19 疫情中面临特殊风险的教育工作者的处境。

65. 特别报告员欢迎许多国家政府为尽量减少教师面临的风险所作的努力，它们采取了物理隔离措施，减少了教室里的儿童人数，并提供了面具等护具。有时，采取这种措施是因为工会对学校复课提出了条件。

66.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工作者仍然得不到保护，或者没有就以后的重新开放获得充足的保障。在像尼日尔这样的国家，一间教室里同时容纳 40-60 名学生，一张课桌坐 4 名儿童，因此在安全卫生的条件下返校似乎是个问题，这不仅引起了对教育工作者健康的担忧，也引起了对学生健康的担忧。在较富裕的国家，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人们对在没有采取适当措施减轻对学生、教师 and 更广泛的社区构成的风险的情况下重新开放学校表示严重关切。⁴⁹

67. 在没有水和卫生设施的学校，这一问题尤其令人关切。特别报告员将在向大会提交的下一份专题报告中讨论这一问题，该报告将侧重于受教育权与享有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

3. 就业状况和薪酬

68. 多份报告表明，在许多国家，教师和其他人员的就业状况和薪酬已经恶化。私营部门的教师和合同不稳定的教师受到的影响尤甚。特别报告员收到了有关终止合同、减薪和延误支付薪酬以及要求教育工作者休无薪假等问题的报告，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强调需要采取性别视角，因为许多教育工作者是女性。

69. 教育国际指出，工会最常提及的受影响工种是私营机构中的教育工作者。其他高度受影响的类别包括(提及频率由高到低)：高校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代课教师；幼儿教育工作者；和移民教师(仅有一个工会提及)。许多答复的工会报告说，以临时合同聘用的教师受学校关闭影响尤甚。随着学校停课，按小时计酬的人没有了工作，签临时合同的人无法续签合同，而且失业的人很难找到新工作。⁵⁰

70. 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私立学校的情况在各个层面都特别令人关切。这些机构严重依赖付费的基本经济模式以及机构中教育工作者不稳定的就业条件，使他们更容易被解雇和减薪。塞浦路斯、摩洛哥、尼泊尔、西班牙和斯里兰卡⁵¹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都报告了这类问题。有些政府作出了努力，试图为这些工作者提供社会保障网，例如在意大利和摩洛哥，但这种情况表明，根据国际标准并在与公立学校工作人员平等的基础上向私立学校工作人员提供保障是多么重要，特别是当他们工作的学校有公共资金资助时。⁵²

⁴⁸ 人权高专办，“联合国人权专家们：每位工作者都是必需的，无论如何必须保护其免受 2019 冠状病毒病感染”(2020 年 5 月 18 日)。

⁴⁹ 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t 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Emergencies, “When should a school reopen? Final report” (28 May 2020).

⁵⁰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VID-19 and education”, pp. 13–15.

⁵¹ Ibid., p. 16.

⁵² 见《阿比让原则》原则 55(e)和 67。

71. 这个问题在一些国家(例如摩洛哥)引起了很大争议, 一些私立学校要求全额支付学费, 包括孩子并没有上学的第三季度的学费, 对这种要求给出的理由是学校为保证远程教育和教师工资进行了投资。一些学校减免了部分学费, 特别是对最弱势的家庭, 另一些学校没有。但据报道, 还有学校向家庭施加压力, 威胁说如果不支付学费, 下一学年就不让孩子入学。⁵³

72.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 一些私立学校已经倒闭, 就像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私营企业也宣告倒闭一样, 其中许多私立学校面临经济困难, 预计随着下一学年入学人数下降将面临更多困难, 因为家庭无力继续支付学费和相关费用。⁵⁴ 特别令人关切的是, 有报告称, 低收费私立学校大规模倒闭, 例如在巴基斯坦⁵⁵, 这将导致准备不足的公立学校遭受突如其来的严重压力, 在重新开学时招收更多学生, 或者导致失学儿童人数增加。⁵⁶ 在肯尼亚, 据称连锁学校集团桥梁国际学院强制教师停薪留职, 仅支付医疗保险和相当于其工资 10% 的每月无偿工资。⁵⁷ 在利比里亚, 同一家公司据报告在员工继续在家工作的同时, 将“关键员工”的工资削减了 80% 至 90%,⁵⁸ 劳动部已经关注并正在调查这个问题。⁵⁹

73. 特别报告员认为, 这是基于私有化和商业化的教育模式局限性的又一例证。⁶⁰ 当教师被解雇或学校关闭时, 孩子们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学校能否重新开学仍不确定, 使孩子们和他们的家庭都非常焦虑。如果教师为了维持收入而找到其他工作, 很可能会像过去一样, 一旦学校重新开学, 就会出现师资短缺。⁶¹

74. 包括非营利宗教学校在内的一些私立学校请求国家提供财政支助, 但并非总能及时得到回应, 例如据报告在阿尔巴尼亚就是如此。⁶² 在这方面, 特别报告员强调, 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认为有此必要, 就必须遵循《阿比让原则》所载向私人教育机构提供直接或间接资助的准则。⁶³ 她回顾说, 各国必须优先资助和提供免费优质的公共教育。⁶⁴

⁵³ 见 www.bladi.net/maroc-ecoles-privees-parents,69523.html 和 www.maroc-hebdo.press.ma/ecoles-privees-payer-frais-scolaire (法文)。

⁵⁴ 例如, 见 Quentin Wodon, “COVID-19 crisis, impacts on Catholic schools, and potential responses: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Catholic Education* (2020)。

⁵⁵ Arshad Yousafzai, “Low-cost private schools may not be able to survive COVID-19 crisis”, *The International News*, 1 April 2020。

⁵⁶ 乐施会提交的材料。

⁵⁷ Paul Wafula, “Bridge schools send teachers home amid coronavirus crisis”, *Daily Nation*, 27 March 2020。

⁵⁸ “Labor ministry expresses concern over labor issues at Bridge International Academies Liberia: several employees express frustration”, *Libeyewitness*, 26 May 2020。

⁵⁹ <https://www.facebook.com/Labourministry2018/posts/2603104286631733>。

⁶⁰ 见特别报告员关于这一事项的报告(A/HRC/41/37)。

⁶¹ 马拉拉基金, “女童的教育与冠状病毒病”, 第 5 页。

⁶² Comité européen pour l’enseignement catholique, *Information Bulletin No. 7* (May 2020), p. 5。

⁶³ 原则 64–74。

⁶⁴ 《阿比让原则》, 总原则 5。

E. 公共教育系统的未来

75. 公共教育系统的紧缩措施和预算削减削弱了它们应对教育危机和确保所有人的受教育权都得到保护的能力。例如，在巴西，削减资金和限制公共支出导致社会政策解体，使利益攸关方无法对这场大流行病采取紧急和强有力的应对措施。⁶⁵ 相比之下，对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有所投资并与民间社会建立了合作和信任的国家更有能力应对危机。

76. 特别报告员理解，必须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和这场大流行病的影响，确定各个国家的优先事项，但她担心的是将资金大规模转用于卫生而牺牲教育的风险，而没有考虑到这些社会服务之间的明显联系。正如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强调的那样，“各国已承诺投入至少 8 万亿美元，以抵御 COVID-19 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以工作权、社会保障权以及适当住房权、医疗保健权和受教育权为基础，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经济。”⁶⁶

77. 此外，鉴于所有国家都受到重大经济危机影响，包括债务增加，特别报告员担心分配给公共教育部门的预算将会大幅减少，尽管公共教育部门表明了其在危机时期，包括在 COVID-19 危机期间至关重要的作用。公立学校资金急剧减少可能会导致教育质量和受教育机会下降，并随着政府未能满足需求的增加，导致低收费私立学校涌现和其他私有化进程进一步发展，从而造成或重新造成学校收费和低入学率。⁶⁷ 危机后时期公私伙伴关系可能扩大，这有加剧教育不平等的危险，同时公民参与或问责有限。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全纳教育的预算可能削减。

78. 虽然有些人呼吁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伙伴关系，但特别报告员强调，必须对这种伙伴关系进行审查，考虑到过去的政策对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影响。⁶⁸ 她进一步回顾说，“提供国际援助与合作的国家不得在享有公共教育的权利方面采取、支持或要求不允许的倒退措施。”她支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即缔约国应利用自己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通过给予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债务减免机制等措施，减轻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的财政负担。⁶⁹

⁶⁵ 人权高专办，“2019 冠状病毒病：联合国专家表示，巴西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考虑不周，置数百万声明于危险境地”（2020 年 4 月 29 日）。另见 Andressa Pellanda and Gabriel Morais, “Brazil: students, teachers’ unions and civil society lead the struggle for the right to education”, National Campaign for the Right to Education, 19 August 2019.

⁶⁶ 人权高专办，“联合国新任贫困问题专家称，2019 冠状病毒病危机凸显全球经济急需转型”（2020 年 5 月 1 日）

⁶⁷ 乐施会提交的材料。另见 Jo Walker and others, *The Power of Education to Fight Inequality* (Oxford, Oxfam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019)。

⁶⁸ 《阿比让原则》原则 46。

⁶⁹ E/C.12/2020/1, 第 21 段。

四. 结论和建议

79. 这场危机有力地表明了教育机构在我们社会中的核心作用，不仅在于落实人人享有优质全纳教育的权利，还在于确保提供可惠及最边缘化群体的若干社会服务、传播卫生信息、发展社会情感技能以增强有复原力的社会的力量、向不得不站在第一线、无法陪伴子女的卫生工作者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及在父母工作的同时使各国经济能够运转等方面。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真正价值应该得到承认。在危机期间，学校和教育界成为重要的团结领域。反思这一经历至关重要。

80. 应在所有国家认真评估关闭教育机构对不同人口群体的影响，同时考虑到歧视的交叉性。虽然这场教育危机显然对最弱势和最边缘化群体影响尤甚，但这是因为它是在已知的根深蒂固的结构性不平等背景下发生的。毫不奇怪，那些最贫困的人，那些因经济和社会地位、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族裔、地理位置、残疾和健康状况而遭受歧视的人，在受教育权和未来生活道路方面将遭受特别长期的后果。现在世界各地许多学校都在逐步重新开放，因此必须建立监督和监测各级学校辍学率的系统。这不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对最弱势群体的影响，也是为了应对下一场危机。

81. 但这种评估不仅要分析这场教育危机的后果，还要分析其原因。应该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解构导致危机期间享有受教育权方面歧视加剧的动态关系。

82. S 因此，评估应包括：对为应对大流行所采取措施导致的不平等加剧进行分析；调查教育系统背后经济和金融模式的可持续性，包括公共教育机构资金不足的后果；审查私人行为体在教育中的作用；评估为教育工作者，包括私营部门的教育工作者提供的社会保护是否充分；以及审查国家行政部门、教育机构、教师、学生、家长和社区之间缺乏合作的情况。

83. 许多政府机构和政府间机构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就解决这场教育危机的短期(包括在学校重新开学时)和长期办法传播了大量有用的指导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建议非常详细，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特别报告员尤其欢迎机构间危境教育网络、人权高专办以及教育国际制定的有益指南。

84. 特别报告员不打算重复或总结这些建议，而是倾向于集中讨论一些概述何为立足人权的危机处理方法的建议。她特别建议：

(a) 对受教育权施加的限制应严格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和国际人权法其他相关条款规定的条件；

(b) 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应将可提供性、可获取性、可接受性和可调适性框架作为政策指南纳入各级教育系统，包括学校一级；

(c) 各国应在国家教育系统内发展全局应急教育准备，并培训各级教育规划人员。这些计划应基于保障人人享有受教育权以及可提供性、可获取性、可接受性、可调适性框架；

(d) 各国应建立危机和灾害规划管理的体制机制。这种机制应在重要的决策层运作，其执行应分散化，确保在地方一级与地方利益攸关方合作通过相关决定，例如学校复课方面的决定；

(e) 所有国家都应作为紧急事项，采取有针对性的特别措施，包括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和减轻这场大流行病对弱势群体以及遭受系统歧视和处于不利地位的社区和群体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优先采用最容易获得的低技术或无技术远程学习方法，并采取措施，如暂停支付学费，向家庭提供现金转移，确保在危机期间向弱势儿童提供食物和其他社会服务；

(f) 铭记儿童的受教育权特别重要，决策者必须特别重视和优先考虑儿童权利。各国应对与危机相关的教育决策进行儿童权利影响评估。此外，各国应提供机会，在 COVID-19 背景下的决策过程中倾听和考虑儿童的意见；

(g) 依照人权高专办在这方面制定的指南，应特别强调每个女童和残疾学生，以及其他边缘化或弱势儿童或学生，包括移民和人道主义背景下的儿童享有持续教育的权利的同等重要性；

(h) 组织在线远程学习(连同广播和电视教学)的安排只能被视为旨在解决危机的临时方案。教育的数字化绝不能取代教师的校内教学。应认真考虑数字教育的位置和内容、其意义和效率及其对儿童和其他学生的健康和教育的影响；

(i) 远程学习工具必须使用适应各地具体情况，特别是当地语言的高质量内容，还必须辅以对教师和学生有效持续培训。这些工具应允许教师和学生提供意见，允许根据学生的水平和能力进行有区别的教学，还应允许学术自由和创造性。它们在设计时应确保保护学生和教师的数据和隐私。远程学习工具应该是安全的，不能让儿童暴露在危险之中，或遭到欺凌；

(j) 各国政府应考虑到，从长远来看，私人行为体凭借数字技术大规模进入教育领域是对教育系统和受教育权的重大威胁。它们应确保，包括通过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私营部门发挥更大作用不会导致寻求从危机中获利的商业实体获取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收集学生和教师的数据或针对儿童和青年的广告。教育和学习解决方案应作为一项公共产品来开发，不需要可能威胁到受教育权的享有和加深不平等的商业许可或其他限制性许可；

(k) 各国应履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的义务，尽其资源能力所及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因此，各国必须加强努力调动国内资源，特别是通过采取累进税收政策。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强调，根据《阿比让原则》原则 34,巩固公共教育系统和优先提供可达到的最优质免费公共教育至关重要；

(l) 考虑到人权的相互依存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危机的应对措施必须是多层面和多部门的，必须在包括教育、卫生、住房、食品和就业的一整套基本社会服务方面采取行动。因此，各国应注意不要将资金大规模转用于卫生或经济部门而牺牲教育；

(m) 如果在特殊情况下，在受教育权方面采取了倒退措施，国家必须确保任何此类措施符合适用的人权法和标准。提供国际援助与合作的国家不得在享有公共教育的权利方面采取、支持或要求不允许的倒退措施；

(n) 应提供充足的援助进一步支持各国的公共教育系统，以此确保危机不会导致教育进一步私有化和商业化；

(o) 缔约国应利用自己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通过给予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债务减免机制(包括取消债务)等措施，减轻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的财政负担；

(p) 捐助方应履行其本地化承诺，确保地方和全国性组织能获得应对危机的资金，并承认这些组织的本土专长及其惠及边缘化人口的能力；

(q) 各国应确保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在危机期间和之后的权利，特别是他们享有公平和良好工作条件、组建和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以及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二条)；

(r) 所有国家和商业实体应确保采取预防和防范措施，保护和确保每一名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健康权，包括心理健康和福祉，特别是在教育机构重新开放时。应特别关注那些面临特殊风险的人；

(s) 应在国家和地方建立政府、教师、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协会和工会以及家长和社区之间良好关系和相互信任。在危机的所有阶段，应保持对话渠道始终畅通，以确保所采取的措施适当、有效并为所有人所接受。在重新开放学校时应与教师及其协会和工会合作；

(t) 应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发展父母和家庭在子女教育中的作用；

(u) 作为一项长期措施，教育机构在发展所有人的心理情感能力和社会的复原力方面的作用应得到加强和重视。
